

宋代川陕四路墓葬特征的区域性研究^{*}

吴 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市 130012)

关键词: 宋代川陕四路 墓葬地域特色 形成原因

KEY WORDS: Chuan-Shan area of the Song Dynast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rtuary Reasons of formation

ABSTRACT: By categorizing tombs in the Chuan-Shan area of the Song Dynasty reported previously, this paper divides these data into five groups corresponding to five geographical regions. The author general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ombs and burial goods in each area,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se factors include social economy, religion,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juxtaposing these data with historical tendency, it expose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ombs in different areas are contingent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migratio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在宋代,“四川”是“川陕四路”的简称,据顾炎武《日知录》卷31《四川》条记载,“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后来益州路更名为成都府路,利州路几经分合,范围略有变化。宋代川陕四路地域广阔,从目前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一地区分属于现在的陕西省南部、四川省中东部、重庆市、贵州省中北部。从地理分区来看,这一地区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南、苗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巫山-武陵山以西。这一地域内,地貌复杂,山脉、河流交错分布,文化面貌有着显著的多样性。

目前,这一区域内发现的宋代墓葬材料较为丰富,不同地区的墓葬反映出了较强的地域差异。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四川地区宋代墓葬的差异^[1],但是并未将其置于宋代川陕四路的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划内进行详细论述。本文收集了这一区域内已发表的宋代墓葬材料,并进行整体分区,共划分为五个地区(图一),它们分别是:

一、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

二、以重庆-大足一线为中心的米仓山-大巴山以南、乌江以北地区(以下简称“重庆-大

足地区”)

三、汉水上游地区

四、峡江中上游地区

五、乌江上游以南、苗岭以北地区(以下简称“乌江-苗岭地区”)

从考古材料来看,墓葬区域性主要反映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上,本文分别对这些地区宋代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特色进行论述,并从社会经济、宗教以及地理和文化交流因素来讨论各区地域特色的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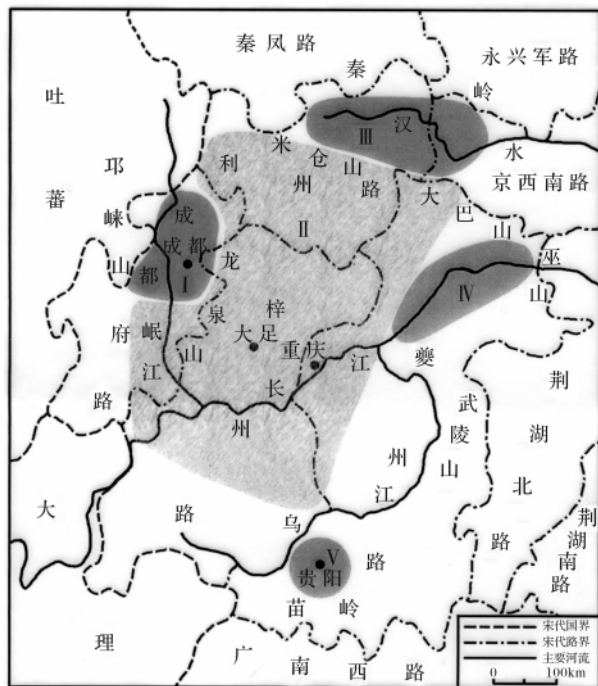
一、成都及其周边地区

本地区主要是指以成都市为中心,龙泉山和邛崃山之间的岷江中游地区(图一,Ⅰ区)。本地区在宋代属于成都府路中北部地区,从现今的行政区划来看,主要为成都市及其邻近地区。

1. 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1)本地区砖室墓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北宋初期墓葬继承了本地区晚唐五代时期小型梯形墓的特点,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发展为大中型的长方形或梯形墓葬,北宋晚期墓葬规模、壁龛数量和随葬品发展到最高峰,南宋时期逐渐简化。

* 本文为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9ZZ011。



图一 宋代川陕四路墓葬分区图

I 区: 成都及其周边地区 II 区: 重庆 - 大足地区 III 区: 汉水上游地区 IV 区: 峡江中上游地区 V 区: 乌江 - 苗岭地区

在北宋晚期,本地区出现了小型砖室火葬墓,这种砖室墓的形制与大中型砖室墓相近,只是尺寸略小,从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一直流行,墓葬的演变也与大中型砖室墓相同。

(2) 本地区报道的石室墓较少,但是一些大中型石室墓的构造显然是受到了砖室墓“肋拱夹龕”式构造的影响,如新津邓双乡 M1 就有大量的壁龕^[2]。南宋时期也有完全模仿小型砖室火葬墓的石室火葬墓^[3]。

(3) 本地区北宋末期开始出现了双层墓,且上层墓室有少量随葬品,应有防盗的设计意图,如成都宋京墓^[4]。在砖室墓中,有的在墓室内放置了石灰、松香等材料进行防腐、防潮的处理,如宋京墓就使用了这样的处理方式,这在川陕其他地区墓葬中极少见到。

2. 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1) 本地区宋墓随葬品最为普遍的是邛窑瓷器。邛窑是我国著名的民间窑场之一,唐宋时期发展到高峰。本地区几乎成为了出土邛窑瓷器的专用地区。

(2) 本地区宋墓随葬俑十分普遍。本地区

唐代墓葬几乎不见俑,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北宋初期较少,北宋中期至南宋时期大量流行。

(3) 本地区流行随葬镇墓券。镇墓券一般立放于墓室四壁或壁龕内,中方券放于墓室后部,东、南、西、北方券按照各自方位对应放于墓室两侧,这是其他地区宋代墓葬所不见的。

(4) 本地区铁钱的发现数量较多,墓葬中随葬铁钱出现比例较高也成为了本地区随葬品的特色之一。

3. 地域特色成因

(1) 社会经济因素。北宋初期的社会形势不稳定,这一时期砖室墓主要是继承了晚唐五代小型砖室墓的风格。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动乱的平息,本地区经济条件也逐渐呈上升的趋势^[5],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南宋前期,四川地区虽然成为抗金前线,浩大的军费支出应对四川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及渡江以后,则四蜀之赋,增三数十倍”^[6],因此百姓已无力像从前那样对待死者,砖室墓的形制与北宋晚期相比也有所简化。南宋后期,宋金在川陕边界重开战事,宋蒙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四川地区是其南下主攻地区之一,可能造成了本地区墓葬形制更加简化,随葬品数量减少、质量下降。

(2) 宗教因素。北宋中期以后道教因素在本地区墓葬中非常流行,这可能与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徐莘芳最早提出南方地区随葬俑是道教文化的体现^[7],本地区出土的镇墓券带有极为浓厚的道教色彩^[8],成都金鱼村 M9 出土的一方墓券中记载,墓主人吕忠庆为“奉道男弟子”^[9],可见道教对本地区墓葬习俗有着深远的影响。

(3) 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北宋开始,川陕四路逐渐成为了专行铁钱的地区^[10],本地区地处最西部,能够流通至此的铜钱数量应比其他地区更少,出土铁钱墓葬比例相对较高。本地区位于宋代疆域的最西部,其与四川以外地区的交通是很不便利的。本地区少见青白瓷和典型青瓷^[11],多数墓葬以邛窑瓷器、俑和镇墓券为主要随葬器物。《陶记》记载“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12],这与本地区的实际发现是不符的,可能是由于本地区地处西部边陲,

外地的青白瓷产品极少运到本地销售。而且,宋代邛窑的繁荣,可能使远道而来的青白瓷产品在价格上也失去了优势,所占市场份额很小。

二、重庆—大足地区

本地区主要是指龙泉山以东、峡江地区以西、大巴山—米仓山以南、乌江上游以北,除成都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外的区域(图一,II区)。本地区范围较大,在宋代分别为成都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和梓州路所辖,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本地区大致为四川省中北部除成都市及其周边以外的地区,重庆市的涪陵以西地区,贵州省的乌江上游以北地区。

1. 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1) 本地区宋代墓葬主要以石材为筑墓材料,这在以土坑墓和砖室墓为主流的宋代是十分特殊的。石圹墓和崖墓在两宋时期都有使用,且形制较为固定,应是本地区传统墓葬形制。

(2) 本地区纪年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特点鲜明,除大足地区以外,其他地点报道的纪年墓年代多集中在南宋高宗后期至理宗前期。无纪年墓与纪年墓的风格十分接近,这种墓葬在本地区可能流行于南宋早中期,衰落至南宋末期。这些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石刻内容复杂,图案多见一斗三升斗拱、门侧武士、四神、出行、妇女启门、家居、侍从、孝悌故事、求仙、瑞兽等内容。其中,出行、妇女启门、家居、侍从、孝悌故事等是中原、北方地区宋代仿木结构砖雕墓的常见内容。武士图案目前在中原、北方地区主要见于山西南部的大治地区^[13],此外,在宁夏西吉地区也有发现^[14],河南、山东等地极少报道。因此这种武士题材的画像内容可能来自晋南和宁南等地区,其中又以山西南部地区为主。而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宋代仿木结构画像砖墓中夫妇开芳宴的内容在本地区画像石墓中很少见到。本地区仿木结构斗拱普遍为一斗三升形制,不见中原、北方地区的复杂结构,可能是由于石雕要比砖雕费力,因此没有像砖雕一样构建更为复杂的结构。

2. 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1) 本地区随葬品中极少见镇墓券,其他器物与成都府地区相近,主要有邛窑瓷器、俑、釉

陶、铜镜等,随葬青白瓷、青瓷、白瓷和铜钱的现象较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增多。

(2) 三台张心娘墓出土的双面俑较为特殊^[15],《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记载天子、亲王的明器中有方相神^[16],《政和五礼新仪·凶礼》中对品官使用的方相进行了解释,“四品以上为方相,黄金四目,八品以上为魃头,两目,九品无。皆深青衣朱裳,执戈扬盾”^[17]。若以文献所载“四目”来看,该俑符合此特征。但是这种明器应在品官以上的人群中才能使用,而该墓墓主人非品官,且该俑造型接近人形,与文献所记载的凶恶造型相去较远,其为“方相”或“魃头”的可能性较小。今后在考古发掘中,若在品官的墓葬中出土形状怪诞的双面俑,可能即是方相类明器。

3. 地域特色成因

(1) 社会经济因素。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与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大致相同,不再赘述。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在这一地区显得较为特殊。大足石刻有其浓厚的文化传统,北宋时期大足地区就出现了此类仿木结构画像石墓^[18],可能是其石刻文化的传统使然。本地区南宋早中期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开始大量流行,这些墓葬分布的地域东至达州、西至乐山、南至遵义、北至广元,大致以大足至重庆一线为中心。两宋之交到南宋时期,大量北方人因战乱南迁,四川地区有大量来自陕晋地区的移民^[19]。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可能是由晋南等地百姓南迁至此,与大足石刻的文化传统融合、扩张后所形成的一种墓葬形式。当南迁的百姓来到此地后,可能利用本地多山多石的自然条件,将原有的仿木结构画像砖墓文化因素与本地石室墓和大足石刻传统结合在一起,使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在本地区南宋时期大量流行。尤其是本地的上层人物,更多地接受了这一墓葬构造,如资中赵雄墓(从一品)、华蓥安丙夫妇墓(从二品)、遵义杨黎墓(从四品以上)、彭山虞公著夫妇墓(从五品)等。随着社会状况的更加恶化,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在南宋后期在本地区逐渐退化并趋于消失。此时发现的两座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均分布于本地区南部的宋代播州地区,即现在的遵义地区,墓主人杨粲和杨文生前均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土皇帝”。这种墓葬

的发展也体现了宋代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因战争而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

(2) 宗教因素。本地区在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同属唐代剑南道地区,道教文化传统也十分浓厚。本地区随葬的俑与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相比相对较少,镇墓券也极为少见,道教因素主要体现在墓葬装饰上,如雕刻在墓室四壁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墓室后壁的求仙图、墓室侧壁或后壁的瑞兽、侧壁的八卦、星宿等。这些在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是见不到的,而且在中原、北方地区墓室砖雕中也少见,是本地区道教因素与墓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3) 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本地区被巫山、龙泉山、大娄山、大巴山包围,区内还分布着许多丘陵。人们在选取筑墓材料时可能更多的就地选取石材,崖墓和许多墓葬更是直接建造在山坡上或崖边。因此本地区以石材为主要的筑墓材料,是由地理条件所导致的。从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分布区域来看,龙泉山似乎是本地区大足石刻文化向东传播的屏障,北方移民在进入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后,融入在当地的丧葬文化之中。

本地区墓葬的盗掘现象虽然也较严重,但随葬青白瓷、白瓷、青瓷的墓葬比例较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高。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区与荆湖北路以及北方地区的交流要比成都府地区更为便捷,因此增加了外地产品在本地的流通和使用。

三、汉水上游地区

本地区主要是指秦岭和米仓山—大巴山之间的汉水上游地区,宋代这一地区属于利州路北部,利州路几经分合后,到南宋时期又向东囊括了京西南路的西部地区(图一,Ⅲ区)。从现今的行政区划看,这一地区属于陕西省南部和甘肃省最南端。本地区宋代墓葬报道的数量较少,报道的材料多集中在陕西南部地区,甘肃最南端尚未有过报道。

1. 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本地区墓葬以砖室墓居多,尤其是北宋晚期至南宋前期的砖砌仿木结构十分发达,如汉中石马坡宋墓^[20]、安康上许家台 M1^[21]、汉中金华村宋墓^[22]等,这是川陕四路其他地区所不见的。

2. 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本地区宋代墓葬被盗严重,随葬品所剩无几。从残余的随葬品来看,以俑的发现数量居多,其次是制作较为粗糙的釉陶器和陶器,少见瓷器,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铜钱。

3. 地域特色成因

(1) 社会经济因素。北宋灭亡后,金与南宋政权在淮河流域、汉水中游和陕西地区展开了长期的争夺,但是宋金战争中,多数土地仍在南宋掌握之中,这场战争对汉水上游地区没有实质性的破坏。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中华村宋墓出土了几百枚铜钱,囊括了大部分北宋年号,最晚为宣和通宝,安康上许家台 M1(1160年)作为迁葬墓仍有神道、石人、石马等墓前设施,汉中石马坡 M1(1162年)、M2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这些都是本地区南宋前期社会经济相对宽松的证据。南宋后期“开禧北伐”再次挑起了宋金战争,而蒙古灭金后川北地区成为蒙军频繁攻掠的地区。此后本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目前还未报道过明确为南宋后期的墓葬。

(2) 宗教因素。本地区宋墓发现数量不多,反映的宗教因素也较少。随葬俑的风俗应是受到了成都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俑的形制也较为接近,这可能是受到了成都府道教势力的影响。

(3) 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本地区以仿木结构砖室墓为主,明显受到了中原、北方地区仿木结构墓葬的影响。中原、北方地区的仿木结构墓葬中,砖砌仿木结构墓室、砖雕人物故事以及壁画共同出现的比例相当高,而本地区多数墓葬没有壁画。在随葬品上,虽然受到南部地区随葬俑的影响,但汉中石马坡出土的俑在制作上又体现出了浓厚的北方唐三彩遗风,可能是本地区北有秦岭与北方地区相阻,南有大巴山与其南部地区相隔,虽然地处南北方交界地带,但是在兼有南北方文化因素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特点。

四、峡江中上游地区

峡江地区大致为乌江的长江入口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本文所指的中上游地区,主要是指乌江口以东至巫山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图一,Ⅳ区)。本地区在宋代属于夔州路东

北部,从现今的行政区划来看,本地区属于重庆市东北部。

1. 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本地区宋代墓葬以土坑竖穴墓和土洞墓为主,“借墓为墓”^[23]和土洞墓是整个南方地区所独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数量较少,砖室墓多为长方形,石室墓多为简单的石圪墓,仿木结构型墓葬仅见巫山瓦岗槽 M18^[24],且形制较为简单,仅用石板和条石砌成简单的仿木结构、石板盖顶。各类墓葬中,小型墓居多,大型墓极为少见。

2. 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本地区宋墓随葬品种类较为单一,以瓷器为主,不见俑、金银器、漆器,很少出土墓志或地券。随葬瓷器中以青白瓷、青瓷居多,釉陶次之,白瓷和黑瓷相对较少,而且瓷器中缺乏定窑、耀州窑、龙泉窑的瓷器,也缺乏较为精美的器物。

3. 地域特色成因

(1) 社会经济因素。两宋时期,土洞墓在南方地区仅出现在本地区,这可能是唐代“安史之乱”后两京地区南下的移民所带来的墓葬形式^[25]。本地区地处群山环绕之中,两宋时期社会、经济一直较为落后,所发现的宋墓普遍规模较小,随葬品简单,不使用墓志和地券的现象比较符合平民的经济条件和身份地位。本地区发现的仿木结构石室墓不是本地文化的传统,显得较为特殊,从其时代来看,为北宋晚期或更晚,很可能是两宋之交因北方战乱少数流落到此的中原地区百姓使用的墓葬形制。

(2) 宗教因素。本地区在宋代一直保持着较为封闭的状态,各类墓葬中既没有体现道教因素的俑、镇墓券或墓内装饰,也很少发现火葬这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佛教影响的墓葬或随葬佛教信物,可见两宋时期佛、道势力对本地区葬俗的影响很小。

(3) 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峡江地区土地贫瘠,可用土地十分紧张,各时期人口居住地的集中势必导致埋葬地的集中,在一个遗址中常常分布着各时期的墓葬。“借墓为墓”现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人们为死者修建墓坑的时候,会偶尔穿凿到前代的砖、石墓室,他们顺势利用了这些墓葬的砖、石材料;第二种,本地区的经济落后,利用前代墓室

的建筑材料以为己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节约了很大的成本。本地区出土的青白瓷、青瓷和白瓷在数量和器型上远远超过川陕其他地区。《陶记》记载四川地区崇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可能只流行于川东地区,而且越往西分布越少。

五、乌江—苗岭地区

本地区主要是指贵州省的贵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属于夔州路最南部(图一,V区)。本地区以山地为主,经济较为落后,考古工作开展较少,本文仅作简要的归纳和论述。

1. 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本地区以石圪墓、岩洞葬以及土坑竖穴墓为主。这些墓葬的形制均较为简单,石圪墓多由石块或石板构筑,往往成群分布^[26],岩洞葬则是在岩洞内放置大量的棺木,有的是几个时代共同使用一个岩洞^[27],这两种墓葬应是这一地区最为传统的丧葬形式。

2. 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本地区宋墓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黑釉陶、铁器、小饰品以及零星铜钱等,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强的原始性。本地区瓷器少见,清镇平坝“棺材洞”采集到几件青白瓷残器,但是“棺材洞”沿用时间较长,它们是否为宋代产品还难有定论,其他类型瓷器则尚未发现。

3. 地域特色成因

(1) 社会经济因素。本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有学者认为本地区的石圪墓是当地少数民族所使用的丧葬方式之一^[28],但其族属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夔州路已是宋代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而作为夔州路最南部的少数民族分布区,各种简单的墓葬形制在各个时代都有使用,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可见本地区经济状况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落后性。

(2) 宗教因素。本地区宋墓受佛、道教势力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但不排除本地葬俗中有自身信仰的可能。

(3) 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本地区大部分被山脉覆盖,地处宋代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政府

开发较少,其他地区的商品更是难以进入本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少。

六、小 结

从宋代川陕四路墓葬的分区和区域特色来看,这些地区多以自然地理的天然屏障为分界线,尤其是山脉、河流对区域的划分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河流在文化因素的传播和交流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些地区宋代墓葬的发展和演变规律来看,无疑都与宋代的经济社会背景、宗教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因素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产生、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墓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宗教因素、地理因素对各地区墓葬自身特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每个地区虽然都处在各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分区中,但在各地区区域特色彰显的同时,不同地区的墓葬也产生了相同或相似之处。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文化因素会随着商品交易在不同地区传播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地区不是完全孤立地发展,而是处在整个川陕地区和宋代社会的共同发展趋势之中。

- [1] 陈云洪. 试论四川宋墓[J]. 四川文物, 1999(3).
-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津县邓双乡北宋石室墓发掘简报[C]//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成都考古发现(2002).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384-401.
-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成都市双流县华阳镇绿水康城小区发现一批砖室墓[C]//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成都考古发现(2003).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347-396.
- [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成都北宋宋京夫妇墓[J]. 文物, 2006(12).
- [5] 程民生. 宋代地域经济[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282-283.
- [6] 黄淮, 杨士奇编纂. 历代名臣奏议: 周南对策[M]. 载吴相湘主编. 中国史学丛书(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永乐本重印).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5: 801.
- [7] 徐苹芳.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J]. 考古, 1963(2).
- [8] 张勋燎. 川西宋墓和陕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道教考古专题研究之三[C]//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 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 [9]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砖室

火葬墓[J]. 考古, 1997(10).

- [10] 巴家云. 宋代四川专行铁钱的考察[J]. 中国钱币, 2005(3).
- [11] 有学者将邛窑瓷器称为“青瓷”,但是“邛窑青瓷”与宋代著名青瓷窑场生产的青瓷相比显然有较大差距,因此本文在此将越窑系、龙泉窑系、耀州窑系等窑场生产的青瓷称为“典型青瓷”。
- [12] 白焜. 宋蒋祈《陶记》校注[C]//文史(第一九期).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3] a. 长治市博物馆等. 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J]. 文物, 1997(2). b. 王进先等. 山西潞城县北宋宋代砖雕墓[J]. 考古, 1999(5). c. 王进先. 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J]. 文物, 2002(5). d. 朱晓芳等. 山西长治故县村宋代壁画墓[J]. 文物, 2005(4). e. 朱晓芳等. 山西长治市故漳村宋代砖雕墓[J]. 考古, 2006(9).
- [14] 耿志强. 西吉县西吉滩黑虎沟宋墓清理简报[J]. 宁夏文物, 1986(1).
- [15] 三台县文化馆. 四川三台县发现一座宋墓[J]. 考古, 1973(6).
- [16] 解缙等编纂. 永乐大典: 陵字: 大汉原陵秘葬经(第8199卷19庚)[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年影印本第91册.
- [17] 郑居中等撰. 政和五礼新仪: 凶礼: 品官丧仪中: 葬(第216卷)[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47-885.
- [18] 邓之金. 四川大足县发现带有雕刻的宋墓[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10).
- [19] 吴松弟. 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3: 86-93.
- [20] 刘长源. 汉中市北郊司马坡南宋墓清理记[J]. 考古与文物, 1984(5).
-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安康市上许家台南宋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2(2).
- [22] 何新成. 汉中市金华村清理一座宋墓[J]. 文博, 1993(3).
- [23] 对早期古墓加以利用的一种墓葬形制,将墓坑建于早期砖(石)墓葬的墓室内或墓室上,有的还利用这些早期墓葬的砖块铺于墓室底部。
- [24]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 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C]//重庆市文物局等编.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48-171.
- [25] 吴敬. 三峡地区土洞墓年代与源流考[J]. 中原文物, 2007(3).
- [26]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 贵州清镇干河坝石棺葬[J]. 考古与文物, 1982(3).
- [27] 熊水富. 平坝“棺材洞”清理简报[C]//贵州省博物馆考古所编.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53~93).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3: 395-404.
- [28] 席克定. 贵州清镇、平坝宋墓族属初探[J]. 贵州民族研究, 1984(4).

(责任编辑 朱艳玲)